

# 《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》

## 有关问题的商榷

张家德

红军长征，在四川的时间最长，活动的地域很广，发生的大事亦多，因而近期《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》一书的问世，读者无不赞其艰辛、珍贵。但笔者在翻检有关资料时，发觉书中个别地方，似有商榷的余地。当然，民国的档案和报刊，不一定都准确，但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侧面的探讨线索，甚至有些还可以作为映证材料。

### (一)关于川南红军

首先，关于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曾经在长官司战斗的说法(该书32页)，笔者尚不敢苟同。

据一九三五年的《镇雄通讯》，红军游击队本“意欲向川南进展”，在“镇属三口塘会合之际”，敌方“探得会合情形”，“遂集议赴罗葡坳截击，始将徐策……击毙”<sup>①</sup>。又据亲自参与这次截击的国民党滇军营长陇德华七月十九日函件，敌军抵双河场时，我军闻讯即向三甲，随由黄连坝过五区长官司一带。敌军获息，即“移队蹇向四区截击”。十七日，我军抵罗葡坳，正在过河，即遭伏击，血战三、四小时，失利撤退。是役，政委徐策和第一支队长等主要干部阵亡，我军牺牲二十余名，被俘十余名，伤四十余名。损失机枪一挺，步枪八支<sup>②</sup>。

以上述史料与书中有关部分相互对照，可以看出：(一)一九三五年七月红军川滇黔

边游击纵队成立以后的确曾与敌人发生过激烈战斗，但地点是在罗葡坳，而不是长官司。

(二)徐策同志不是“身负重伤，抬到罗葡坳牺牲”，而是在十七日的战斗中捐躯的。

(三)红军游击队当时的行动方向，书中说是三叙永县境移至长官司，实际上是由镇雄县由口塘欲向川南，途经威信县境的。(四)此役红军的伤亡情况，书中说“指战士牺牲百余人，游击队损失很大”。实际上，根据敌人经常夸大的说法，我军损失尚不足百人之数。

其次，川南红军是否从此就“转入隐蔽活动，进入休整”，笔者也浅谈点不同看法。

罗葡坳战斗后，川南红军“一面收容队伍，一面向四川推进，直取古蔺”<sup>③</sup>。在中途攻水潦堡余家洞子，因川军截击，又折往水田寨渡河，进入镇雄县三区、二区，复取毕节县吴家屯，围攻镇属二龙关，造成镇雄极度恐慌。八月十六日走红岩，十八日午抵赫章分县，“接触三小时”，遂“绕道”攻入。我军仅伤亡三人，在县城也从容休整了两天多。二十日夜半撤出，牵动了毕节驻军赵旅<sup>④</sup>。二十一日我军在六曲沟构筑工事，诱惑滇军王营、陇营和安化、安沛然团队星夜来追。我军夜半又撤，次日直向镇城，吓得敌军一天奔跑一百三十里，只吃了一餐饭，被迫龟缩镇城。我军二十五日由石头沟取道

入川，二十八日遂将筠连城占领。

这仅仅是七、八两月中四十余天的突出活动，但亦足以表明：川南红军不仅没有“转入隐蔽活动”，相反地接连奋战，大大扩展了游击战的范围和规模，被牵制的敌军越来越多。

## （二）在皎平渡口的渡江日期

关于巧渡金沙江的日期，书中与多数看法一样，定为“从五月一日夜间起，共计九天九夜”（该书46页）。对此，笔者却另有一孔之见。

据宋任穷同志说：“在‘五·一’那天，主席向刘伯承同志和我指示：你们这个营要加快走，占领渡口。”李作荣同志亦回忆：刘伯承来动员时，“太阳已西下”。他说离金沙江一百八十里，“要我们一天一夜赶到”。于是张明远先遣工作组在前卫连掩护下，“半夜就出发”，赶到江边“天已黄昏”<sup>⑥</sup>。显然已是第二天——五月二日的黄昏。

当年曾帮助我军渡江的老船工张朝满口述：“猪年的三月卅晚上”，红军就到了我们洪门厂村子。“四月初一，东方刚露出一丝丝亮光，我们划着二十四个红军渡过了金沙江”<sup>⑦</sup>。猪年，即一九三五年；三月卅晚上，即公历五月二日晚上；四月初一，即公历五月三日。宋任穷、王智涛等亦认为，“天刚拂晓就渡江”。况且，中央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亦有“五月三日渡江”的电文。大多数资料还有一个集中的看法，都认为我军占领北岸渡口后，立刻向前控制制高点，与敌军遭遇，当日就到了通安。这正是“五·三”那天<sup>⑧</sup>。另外，可以证明“江”日渡江的档案资料还有四则<sup>⑨</sup>。江日，即三日。由于对我军五月九日完全过江的看法是一致的，所以，一直保护船只、护送过江，从未离开渡口的总部工兵连支部书记李锡周同志说红军大部队“一个星期从容地过了江”<sup>⑩</sup>，是相当可靠的。

综上所述，在皎平渡口，从五月三日拂晓起，共计七天七夜渡过金沙江，是我红军历史的原貌。

## （三）关于攻克通安镇

攻克通安镇的战斗，书中认为我军是“次日”（二日）下午三、四点钟开始进攻，三日攻克的（参见该书44、47页）。详细过程尚待进一步探讨。

首先是攻克通安的确切时间。据肖应棠同志说：霍海元率领的红军前卫连，三日晨由中武山渡口往前赶十五里山路，刚休息吃早饭，又接到命令占领制高点，遂与敌军遭遇于通安南面的狮子山<sup>⑪</sup>。又据敌军刘元塘部营长“北海驰函报称”：红军于江夜（即三日夜），业将通安占领。有关江夜之说的材料还有三则，甚至确切到红军“江日午后八时”占领通安<sup>⑫</sup>。其次是占领之后还有反复。我军于三日夜占领通安后，刘元塘“一夜行百五十里，亲往督剿”。因敌众我寡，我军于“支巳”即四日上午十一时撤出。李作荣同志说：“我们冲进通安，并占领了通安镇，缴了敌人的一门迫击炮。敌人又以三个团的兵力向我们反扑过来，我们只一个营六、七百人，又把缴来的炮丢给了敌人。我用机枪掩护着战士往下撤”。这时，已经过江的周副主席，接到这个紧急情况，就担心我军背水作战，遂果断命令总部警卫营的两个连拉上去，由宋任穷、陈赓等同志率队跑步增援。“下午四点多”反攻，“天黑”再克通安。根据战史部的资料，军委总部是五月四日过江的，说明周副主席处理这个紧急情况是在四日，从而证实再克通安的时间亦是四日<sup>⑬</sup>。

上述各类资料，确凿地记载了通安战斗的具体过程。说明我军与敌军在狮子山接触的时间不是“次（二）日拂晓”，而是三日上午。突破狮子山防线后也并不是一举就占领通安的。

#### (四)关于“佯攻会理城”

由于摧垮敌军康南防线的重镇会理，对我军兼程渡江后的休整、补充，以及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和红军跨入康南后的顺利进军，有特殊意义，所以当时我军有“打开会理休整”的打算。从战略部署看：我军干部团就近佯攻会理后再前出箝制敌援；五、九军团作侧、后战略掩护；奔渡疲惫的一军团休整后续进；三军团则及时接替了干部团，进入了攻城阵地。上述情况证明，我军是作好了占领和强攻的准备的。从整个战斗过程看，红军使用了数百架梯子夜间恶战，并掘通和轰坏城垣，占领了外城。敌首刘元塘和团长文清等被击伤，其士兵伤亡者千余，损失达千万元。由于“激战甚烈”，逼得蒋介石亲自出马，以“铣函并犒赏洋五千元”，给刘元塘一伙打气。三军团以一个包围，两个围攻，烽火连天，长达八个昼夜。从投入兵员众多，延续时间较长，战斗状况猛烈，并有战略配合和种种战术的使用，都说明了攻城已具有相当规模。由于“攻击未奏效”，“原来准备打开会理休整的，未打开也就不打了”<sup>⑩</sup>。而民国《西昌县志》亦载：“红军乃以会理屡攻不下，遂不攻城郡”。可以说，从围攻会理的目的、部署和规模来看，对会理是强攻未下，而不是佯攻。

#### 注释：

①② 《云南民国日报》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六日，第六

版。

③ 《云南民国日报》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十日第七版。

④ 《云南档案》：《沈义方致龙云电》（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）。

⑤ 参见《红军长征过云南资料选》：《一九七六年元月三日访宋任穷同志谈话摘要》；《原干部团李作荣同志访问记录摘要》；《原国家保卫局侦察员张明远同志访问记录摘要》。

⑥ 《红军巧渡金沙江》，载《云南文物简报》（一九七五年一月）。文中将三月卅注为公历五月一日，据《新编万年历》，其注不妥。

⑦ 参见《红军长征过云南资料选》：《原干部团主任教员王智涛同志访问记录摘要》；《访问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部负责人倪云同志谈话纪要摘录》（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）；《原干部团成仿吾同志访问记录摘要》。

⑧ 参见《云南档案》：《刘元塘致龙云急电》（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），《蒋介石致龙云特急电》（一九三五年五月七日），《刘元璋致龙云电》（一九三五年五月七日），《刘湘致何健急电》（一九三五年五月七日）。

⑨ 《红军长征过云南资料选》：《原军委纵队工兵营支书李锡周同志访问记录摘要》。

⑩ 参见《红军长征过云南资料选》：《一九七八年七月八日访问原干部团前卫连长肖应棠同志谈话摘要》。

⑪ 参见注⑧。

⑫ 参见《红军长征过云南资料选》：《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访问原军委总部参谋黄鹤显同志谈话摘要》。《云南档案》：《刘湘致龙云急电》（一九三五年五月七日）。

⑬ 参见《红军长征过云南资料选》：《原干部团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同志访问记录摘要》、《一九七七年七月八日访问原三军团工兵连排长刘调元同志谈话摘要》；《云南档案》：《刘文辉致龙云限令到电》（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）、《刘文辉致龙云急电》（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）；“铣函”，即十六日信件。

#### 我院文科各系邀请国内外专家来院讲学或作学术报告

我院文科各系今年以来陆续邀请国内外专家、学者来院讲学或作学术报告。七、八月份，历史系邀请来蓉旅游的美国克拉克学院历史系教授杰克·林格乐博士来院举办了“美国历史讲座”。本学期，外语系又通过签订交流协议的美国戈申学院，邀请了詹姆斯·邦伯格教授和他的夫人爱丽丝·邦伯格副教授来院，为该系毕业班讲授《美英文学》、《应用语言学》和《英文写作》等课程。外语系邀请北京外国语学院著名教授许国璋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

究所的台湾籍研究员廖忠秋二同志来院，分别作了《当前英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》和《谈谈语言学》的学术报告。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，历史系还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、原吴玉章同志的秘书王宗柏同志来校，作了《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》的学术报告。与此同时，中文系又请王宗柏同志作了《学习吴玉章同志的文改思想，促进汉字改革》的学术报告。

（邓奎金）